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张朝柯·著

《春香传》
的
创作及影响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香传》的创作及影响/张朝柯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1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李文禄、张朝柯主编)

ISBN 7-5610-4098-9

I. 春… II. 张… III. 小说-文学研究-朝鲜-中世纪 IV. I3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462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朝阳新华印刷总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94 千字 印张: 4.375

印数: 1-3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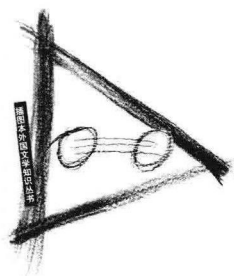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李欣

封面设计: 白雪竹

责任校对: 王晓红

版式设计: 李路明

(全九册) 定价: 72.00 元 本册定价: 8.00 元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学术顾问：季羨林（北京大学教授）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

李赋宁（北京大学教授）

主 编：李文禄（辽宁大学编审）

张朝柯（辽宁大学教授）

特邀编审：（按笔划顺序）

刘安武（北京大学教授）

孙凤城（北京大学教授）

李明滨（北京大学教授）

何乃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鸿年（北京大学教授）

陈 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罗经国（北京大学教授）

陶德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朝柯

张朝柯 男，辽宁大学教授，1929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5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年至1960年进修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曾任辽宁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东方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原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朝鲜文学研究会理事。

八十年代以来，参加编写的专著、教材有全国通用教材《东方文学简史》和《外国文学史纲》等21种，编著的有《印度民间故事》、《东方寓言》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 录

一、英正时期的社会特点

社会经济的明显发展	(1)
矛盾冲突的日益激化	(5)
近代文明的强烈影响	(9)
实学派的改革主张	(12)

二、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

口头文学创作的积累	(17)
国语小说传统的继承	(25)
实学派创作理论的影响	(33)

三、动人心弦的艺术典型

春香	(39)
李梦龙	(51)
卞学道	(67)
群众的形象	(72)

四、《春香传》的主题思想

揭露两班虚伪 抨击两班罪恶	(80)
反对身分制度 提倡万民平等	(83)
主张“实用” 宣传改革理想	(87)

五、说唱文学的艺术特色

- 说唱文学的明显影响 (93)
- 展示人物性格的多种手法 (99)
- 刻画人物形象的对比技巧 (105)
- 说唱结合、诗文并用的文体特征 (108)

六、中国文学的鲜明影响

- 借用中国典故突出修辞效果 (112)
- 善用中国古籍增强表现力量 (117)
- 巧用中国诗句激发艺术魅力 (121)
- 中国文学的消极影响 (126)

七、创新精神和民族风格

- 形成民族艺术特色的重要条件 (130)
- 构成民族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 (133)

一、英正时期的社会特点

《春香传》，这部在民间口头文学基础上形成的、反映李朝古典文学卓越成就的名著，大约定型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全州出版《烈女春香守节歌》为下限，最晚也不能晚于19世纪上半叶。那么，李朝英正时期的社会环境，乃是《春香传》产生的历史背景。

其主要特征，有如下四个方面。

社会经济的明显发展

18世纪以后，在李朝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农业、手工业、矿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有了进一步的扩大，水利事业也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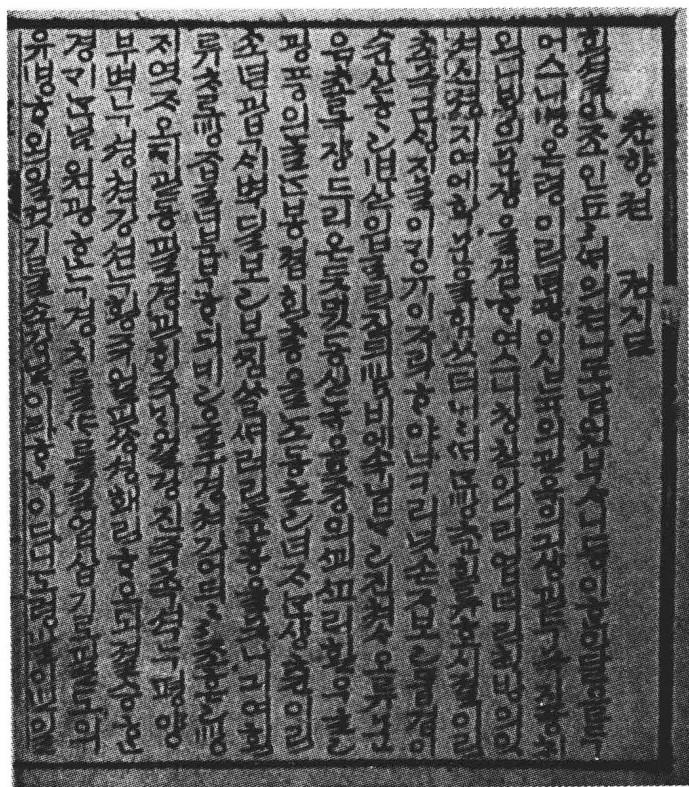
在农业生产上，重视改造自然，将荒山野地开辟成大面积良田，把大量的旱田改造成水田。同时，随着各个宫房、官衙和军事机构的扩大，宫房田和屯田的面积也得到了扩展。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更加注重土地的合理使用，在三南地方，推广了插秧前在稻田中先种大麦的先进办法。这是一年两熟的农作法，使粮食的产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由于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政府对水库、堰堤的保护和兴建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1730年，政府使堰堤司改属于备边司，指令全国各道每年调查和报告大小水库、贮水池的实际情况，并认真加以保护和修复。各地人民群众也发扬爱国热情，增强了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兴修了很多水库。1799年修建的水原西湖水库，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贮水池，在18世纪末，用于农田灌溉的大小贮水池，相继得到了修复和扩建。德山的合德池、咸昌的恭俭池、金堤的碧骨池、延安的南大池等，经政府登记的堰堤总数是3529个，拦河坝总数是2265个。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田的高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又重新出版了早年编写的《农事直说》，相继又出版了《增补山林经济》。在许多地方，也各自出版了不少农书。这些书籍，不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并且总结了各地的先进生产经验。例如：救荒作物——甘薯，经过长期的研究，创造了适合于当地土壤、气候的种植方法，还编写、刊印了《甘薯谱》。许多具有新思想的爱国学者在甘薯的研究工作中表现了对人民粮食问题的关心，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极大热情。

人参，对换取外汇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种植人参的地方越来越多。在南部的全罗、庆尚和忠清各道，参农日益增多，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在中西部古都开城，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栽种、经销人参为专业的药材商人。

具有同样商业价值的烟草，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良田里广泛地种植烟草，其收入较之种植庄稼有成倍的增加。因此，烟草的种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南原古词《春香传》书影

——原书保存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在手工业方面，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官营手工业中，武器、陶器、纸张、绸缎和印刷等行业，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李朝的武器制造，早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并显示了威力。到了18世纪，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著名的武器创制者安鼎基不仅研制了敏捷、坚固的“兵车”、“背鬼甲”、“双刃麻札刀”、“佛狼机”，而且还制造了“红夷炮”等各种大炮和种类不同的鸟枪。司瓮院烧制的瓷器、尚衣院纺织的宫中使用的高级绸缎，都是深受称赞的高档产品。造纸署监造纸张，远销国外，在中国备受青睐。伴随着造纸业的发展，校正馆的出版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曾经多次改铸活字，出版了大量的书籍。

民间手工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其规模和产量，往往超过了官办手工业。例如：尚衣院纺织的高级绸缎，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但是，民间纺织业在不断扩大范围，甚至可以垄断唐丝和常丝——国产生丝，大量生产绸缎。历来只能依靠中国白丝的纺织手工业，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完全可以用国产原料生产出同中国相匹敌的高级纺织品。这应该说是民间纺织手工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矿业生产，在银矿、金矿和铜矿三个方面的情况，各有不同。银矿开采的高峰，大约出现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此后，就逐渐衰退了。金矿的开采，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显得日益兴盛，富有活力。但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以后，官家开采的金矿，因入不敷出，不得不停工。但是，在民间，非法开采金矿的活动，却日见兴隆，尤其是在平安道，这已经成为农民谋生的一个主要手段。虽然遭到政府的反对，却屡禁不止。在全国各地，金矿的非法开采，

越来越多。铜矿的开采，也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活跃起来的。遂安、宁越、报恩和延安等地的铜矿，都是由于货币铸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营矿山的大商人，往往以重金征募雇佣劳动者，使破产农民转化为矿工。在18世纪出现的这种矿山经营的新形式，到了19世纪初，在北部山区的矿山经营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18世纪，常平通宝排挤掉白银，在金属货币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货币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货币地租的出现和发展，使李朝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粮食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雇佣劳动者的出现，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李朝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

货币集中在少数官僚两班手中，大多数的百姓都没有货币，也无法得到货币。这种严重的“钱荒”现象，造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官者的残酷剥削，荒淫无耻，日甚一日；另一面，无论城市居民和乡下百姓，备受压榨，不断破产，总是无法摆脱在水深火热之中越陷越深的悲惨命运。

矛盾冲突的日益激化

李朝社会的矛盾冲突，既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也存在于官僚两班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党争”正是其内部勾心斗角、分崩离析的具体表现。

进入18世纪以后，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官僚两班和各个官房衙门想方设法扩大土地面积，竭力加速土地私有化的进程。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剥削愈加严重，各种封建剥削的加重促使农民更加赤贫化。丧失全部或部分

土地的农民、佃农，不仅要向地主缴纳一半的佃租，而且还要承担政府不断强加的“军布”等重负。这正像洪启禧所说的：他们（指应缴纳军布的——原引者）没有从祖先那里得到土地，只得耕种地主的地。一年收获不过十石，还得将半数交给地主，剩下的那点怎么能缴纳相当于二十两（货币单位，百文为一两——原注）的军布？^①

当时，无法摆脱悲惨命运的农民，无奈只好“以五六斗米或三四十两钱出卖自身^②”。

朴齐家在向国王介绍当时农民悲惨情况时，也说：山间百姓开垦火田，上山打柴，磨秃了十指。他们穿着十年前的破衣，住着又狭又矮的屋子，屈着背才能进去，屋子被烟熏得乌黑。他们用破铜碗吃饭，吃的是没盐的野菜。厨房里只有小木勺和土缸，问主人，主人回答说铁锅和铜筷子多次被里正（乡吏）抢走缴给了国家。问及徭役情况，主人说，他们不是给人家当奴婢就是每年缴纳约二十五六两钱做军保。虽然军保是国家的经济来源，但是大丈夫不能不为国而像织麻布的寡妇那样忧愁。我认为，如果不改变今天的习俗，国将危在旦夕，这是不容迟疑的。这种情况不仅是各邑，而且是全国普遍的现象……^③

残酷的剥削和可怕的灾荒，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暴动，反抗暴政。1703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忠清南道的天安、京畿道的抱川和黄海北道的瑞兴等地的暴

① 引自《朝鲜通史》，第20章，第三节。

② 引自《朝鲜通史》，第20章，第三节。

③ 朴齐家：《北学议》（译文），转引自《燕岩 朴趾源》，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20页。

动，斗争英勇，规模最大。1710年，在全罗道卢岭附近，以十多邑流民为中心，又爆发了武装起义。1721年，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农民起义；1727年，以全罗道边山半岛和灵岩月出山为根据地的流民武装起义；1733年，全罗道沿海各地又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738年，平安道三处流民武装起义；1741年，在江原道、平东道和黄海道等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这一形势迫使封建政权不得不修改残酷剥削农民的军布法和身布法，并修改或废除各种恶刑和恶法。

18世纪的李朝社会，对奴婢依然进行残酷剥削。奴婢不只是受到身贡的残酷剥削，还要遭受贡献斜付（到宫廷服劳役）和编入束伍军（地方军队）的逼迫，甚至还要承受意想不到的许多搜刮。不论是七般公贱（即妓女、内人、官奴婢、驿卒等隶属于官方的七种贱人），还是八般私贱（即僧侣、才人、巫女、私奴婢、白丁等）都是官僚两班恣意剥削和欺凌的对象。公私奴婢为了反抗和斗争，有的逃进深山，有的参加了起义军，同封建统治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也迫使当权者不得不一再做出“让步”。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日益加深，激发了官僚两班内部的冲突，使由来已久的东西两派之间的党争，到了英祖继承王位以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老论”与“少论”两派之间的党争，尖锐激烈，互相倾轧，不可调和。1728年，以李麟佐为首的一部分“少论”派两班叛乱，率兵占领了清州，因受到政府军的攻击而失败。从此，“少论”派势力受挫，并受到“老论”派的压抑；但又心怀不满，不甘心于失败，总想伺机反扑。面对这种政治形势，英祖采取的所谓“荡平政策”——禁止儒生们有关争论政治是非的上

疏；在选拔人材时，既录用“老论”派，也录用“少论”派，以缓和党争。继英祖之后的正祖，依然采取“荡平政策”，虽然没有出现武装冲突那样的重大事件，但是，党争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无法根绝。

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对党争是厌恶的。如：李重焕便提出批评：自辛壬（辛丑、壬寅即1721年和1722年，景宗初的所谓辛壬土祸——引用者）以来，朝廷之上，老少南三色仇怨日深，互以逆名加之，而风声所及下至乡曲作一战场，不但婚娶不通，至势不相容。……大抵自开辟以来，天地间万国中人心之垂败陷溺直失其常性者，莫如今世朋党之患，遵是而无改，则其将为如何世界乎？！^①

李瀼对四色党争也提出指责：两班之间公然进行斗争，三三五五，各自结党，一派得势，他派则皆被驱逐。在这样互相残杀的气氛里，天地非变不可，草木也非枯不可。^②

这样的党争，表面上似乎是地位名分 and 不同政见之争，实质上在于争夺土地和政治大权。党争之祸，严重地危害了封建政权。掌权的一派互相包庇，助长了营私舞弊，降低了官府的威望，削弱了国家的防御能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

① 李重焕：《择里志·人心篇》，转引自《燕岩 朴趾源》，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页。

② 李瀼：《星湖僊说类选》上卷，转引自《燕岩 朴趾源》，第26页。

近代文明的强烈影响

17世纪以后，开明之士对欧洲才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逐渐地传入了李朝社会。欧洲的近代文明和科学文化给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带来了明显的影响。

早在1603年，派到中国北京去的使臣李光庭带回欧洲的地图，一些知识分子才逐步了解欧洲的地理轮廓。1631年，去北京的陈奏使郑斗源又带回来西洋枪、千里镜、自鸣钟和焰硝花等物，以及有关天文书、天文图、西洋风俗记和千里镜说等科学知识书籍。1644年，仁祖的儿子又从北京带回德国传教士赠送的天文学、数学、天主教的书籍以及地球仪、天体图等。1653年，施行了由北京带回来的时宪历法。1793年，李承薰带回来《天主演义》、《几何原本》和《数学精蕴》等数学书籍。

大约从17世纪到18世纪，经过先进学者李瀾、金万重、洪大容、朴趾源等人的介绍，欧洲的天文学、历法、地理学、医学、数学、武器学和音乐学等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不断传入李朝社会。这使李朝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欧洲文化和科学技术，以及中国的各种先进的生产方法，并将外来文化同本国文化进行了比较，从而越来越认识到李朝闭关锁国的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并启发他们认真探讨落后的真正原因。

同欧洲先进文化的接触，又受到清朝学者考证学的影响，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对程朱理学崇尚空谈的陈腐学风，提倡“实事求是”地研究国家现状的治学精神；于是，

“实学派”愈加发展起来。他们对自然科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著书立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实学派学者洪大容（1731—1783），便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世人称赞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受到欧洲考皮勒尼克斯天文学理论影响之后，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名著《筹解需用》，对李朝天文学、数学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反对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坚定地主张：地球是同日月一样也是圆的；而且同金星水星一样也是动的。同时，他将日蚀、月蚀同潮起潮落等现象联系起来，把风雨、霜雪、雷电等现象同天文气象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李朝社会前所未有的说明和解释。唯独关于地球自转的学说，在《筹解需用》中并未涉及。然而，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鹄汀笔谈》中介绍洪大容的学说时说：西人既定地为球，而独不言球转，是知地之能圆，而不知圆者之必转也。故鄙人妄意，以为地一转为一日，月一匝地为一朔，日一匝地为一岁……敝友洪大容，又创地转之论。……洪亦未曾著书。鄙人，尝信他地转无疑，亦尝劝我代为著说。鄙人在国时，卒卒未果。^①

这表明：洪大容在撰写《筹解需用》之后，他的天文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有些新观点并没有写在自己的著作中。虽然洪大容拜托朴趾源代为著书，但他也终于“卒卒未果”。

朴趾源所说的：“西人既定地为球，而独不言球转”表明：地圆说是欧洲人输入李朝的。地转说虽在欧洲早有定

^① 朴趾源：《热河日记》中《鹄汀笔谈》，引自《燕岩选集》，新朝鲜社，1955年版，第125页。

●《春香传》的创作及影响

论，但是在李朝社会中的提出并加以宣传却是洪大容的功劳。

洪大容的科学著作，除了《筹解需用》，还有一部《磬山问答》。其中，研究天文学和数学的部分，占有重要地位。洪大容企盼国家富强的先进思想和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其遗著《湛轩书》中有着详细而生动的反映。

洪大容的挚友朴趾源（1737—1805），也是一个精通天文、历史、地理、经济、军事和音乐等各种学问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和洪大容志同道合，不仅深信：地球是圆的，自转一周是昼夜；而且同样了解：星球比太阳大，太阳比地球大，地球比月亮大。他认为：宇宙并不是神造的，世界的基本因素是微尘。他说：世界如何？……吾等尘界……则亦当有物积聚凝成。如今大地一点，微尘之积也。尘尘相依，尘凝为土，尘麤为沙，尘坚为石，尘津为水，尘暖为火，尘结为金，尘荣为木，尘动为风，尘蒸气郁，乃化诸虫。今夫吾人者，乃诸虫之一种族也。

……惟彼满天星宿，都不与此地相干。独此三丸（指日月地——引者）自相邻比，为地所私，立号日月，资日为阳，资月为阴。……自彼满天星宿，视此三丸，其罗点太空，自不免琐琐小星。^①

尽管朴趾源的看法并不科学，但是其中却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曾访问过中国，在看到新的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之后，竭力主张向欧洲和中国学习。

在洪大容和朴趾源的影响下，18世纪末叶，出现了李

① 朴趾源：《热河日记》中《鹄汀笔谈》，引自《燕岩选集》，新朝鲜社，1955年版，第124页、第126页。